



斯諾登與棱鏡門 “老大哥” 來了！



2013 年是個“有意思”的年份，特別是在信息泄露這一點上，頗有連續劇一集接一集的感覺。先是在 4 月份，ICIJ 公布了大批量的境外信息，風波未平，接下來又是 6 月份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工作人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及其披露的“棱鏡門”（Prism）項目，真可謂精彩紛呈，讓人目不暇接。

境外信息泄露 VS 斯諾登 棱鏡門

也許你會覺得奇怪，本期《宏傑季刊》要討論的不是境外信息泄密嗎，為何會突然筆鋒一轉將話題引向了斯諾登與棱鏡門呢？在具體展開本文之前，我們認為非常有必要與你分享對於這兩個事件關聯性的認知與考量。

首先，境外信息泄露和斯諾登棱鏡門事件都無可置疑地屬於“信息泄露”的範疇，二者都對所涉各方影響很大，即便是普通民衆也對其有所關注，特別是斯諾登及棱鏡門事件，更是成爲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

其次，二者都牽涉到信息的透明度和個人隱私保護的問題，如何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一旦平衡被（無論是由個人比如斯諾登，還是由機構比如 ICJ，或者政府比如美國）打破，該如何界定責任邊界，又該如何完善制度、技術和人，從而重新的、改進後的平衡狀態。

再者，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透明，也沒有絕對的隱私。無論境外世界多麼希望保持銀行、投資者信息的隱私，也不管世界各國普通公衆多麼不樂意受美國或他們自己國家情報機構的監控，但都幾乎不可能。利益的存在導致立場的不同，甲之隱私，可能就是乙之透明，反之亦然。事實上，隱私和透明不過是信息的一體兩面，二者如影隨行，難以獨存。

說到底，控制無處不在，祇是程度有差別而已。通常，控制也并不是非此即彼。昔日的大英帝國一度也像現在的美國，在搜集、控制居民信息方面是毫無爭議最嚴密的國家——其公共廣播蜚聲全球便是一個明證。但是，搜集信息并不能完全等同於對隱私的侵犯，因爲很多時候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在信息搜集的基礎之上。如果國家所搜集信息並沒有影響到普通人

的正常生活，這是可以被接受的。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度”的問題，祇有在信息搜集無孔不入到幹擾普通人正常生活，也就是肆無忌憚、無法控制的時候，二者才有必然的聯系。斯諾登所披露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行爲已經進入私人領域，某種程度上，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裏所描繪的圖景似乎正在上演……

斯諾登及其讓人眼花繚亂的 棱鏡門

一個叛變的 CIA 特工，秘密逃往海外，威脅爆出所有國家機密，政府對其展開拘捕，發誓讓其消聲……這不是又一部俗套的好萊塢電影，這是曾經發生的真實故事。

愛德華·斯諾登 (Edward Snowden)，30 歲，前 CIA 僱員，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還有一個年薪達 20 萬美元的穩定職業；現在，他將永遠失去上述身份——他成了一個“深喉” (Deep Throat)，一個無法定性的人——英雄 VS 叛徒。

在做出上述舉動之前，斯諾登是美國國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承包商博思艾倫的員工；如果按照中國的標準，斯諾登就是典型的“臨時工”了。當然，在其他國家，沒有“臨時工”這樣的稱呼，大體上算是“外判工”。

2013 年 6 月，斯諾登將美國國家安全局關於棱鏡門監聽項目的秘密文檔披露給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隨即遭美國政府通緝。

事發時，斯諾登人在香港，并在香港停留 22 天。

2013 年 6 月 21 日，斯諾登通過《衛

斯諾登與棱鏡門：“老大哥”來了！

報》再次曝光英國“顛顛”⁸ (Temple) 秘密情報監視項目。

2013年7月1日，維基解密網站日前披露，斯諾登在向厄瓜多爾和冰島申請庇護後，又向19個國家尋求庇護。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維亞3國已經表示願意為他提供庇護。

2013年7月16日，斯諾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2013年8月1日，北京時間7:30斯諾登離開俄羅斯謝列梅捷沃機場前往莫斯科境內，並獲得俄羅斯為期1年的臨時避難申請。

在斯諾登事件之後，奧巴馬繼續為監控辯護，“……你不可能保持百分之百隱私……獲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我們將不得不做出一些選擇……”由此可見，隱私與自由已經變得多麼稀有和寶貴了，即使是在美國！

注釋：

8 讀音為“niè rú”，相對應的英文為“Temple”，意思是人和某些其他哺乳動物頭兩側的區域，在眼和前額之後，額弓之上，耳之前，常引申為聽、聆聽之意。中國境外中文媒體，亦將“Temple”譯為“聖殿”。



方塊知識 5：水門事件中的“深喉”

深喉 (Deep Throat)，即在水門事件中為記者提供重要資料的人。1972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依據綫人“深喉”的消息，撬開“水門事件”的內幕，導致時任的美國總統尼克鬆辭職下臺。事後，這兩名記者一直拒絕透露當時綫人的身份。

正是得益于內綫“深喉”的信息，“水門事件”內幕才大白于天下。因此，為了公眾利益而奮不顧身地作證的人，新聞調查通常稱他們為“深喉”。

與“深喉”聯系、報出“水門事件”的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當時都很年輕，但他們因此一舉聞名世界，並獲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獎。他們的經歷給無數年輕記者以信心和激勵，鼓舞記者們勇敢、執著地追蹤事實真相。“深喉”事件改變了美國的新聞報道，使那些秘密的消息從此開始更多地登上“大雅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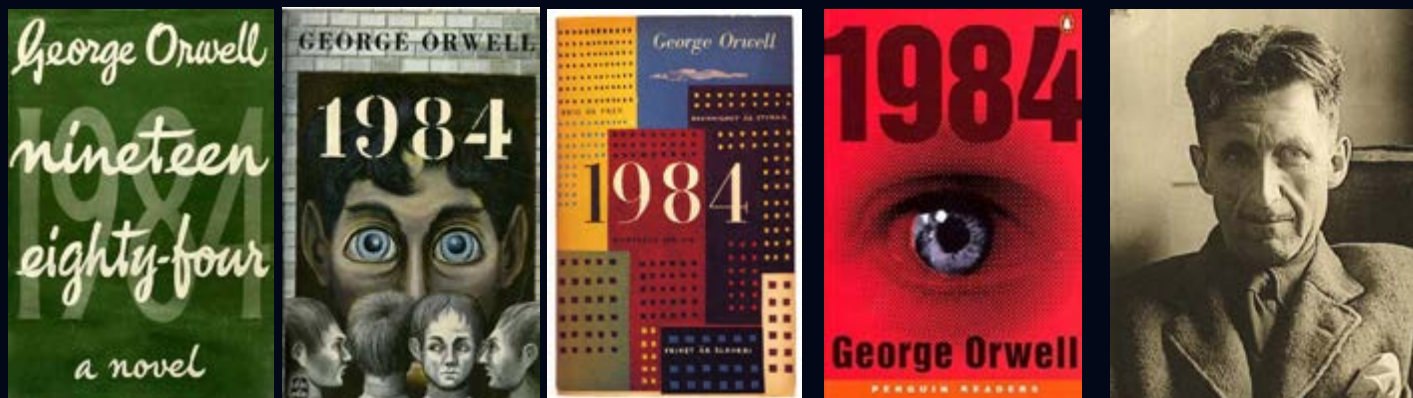
在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上，“水門事件”成為最大的政治醜聞之一。作為在競選時發生的最為嚴重的政治腐敗行為，這起事件的教訓對美國的政治體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導致民眾對總統的看法和印象開始發生某些改變，總統權力也受到更多限制和約束。儘管此後美國兩黨政治競選愈演愈烈，雙方也是奇招迭出，但是40多年來美國歷任政客都以史為鑒，不敢突破這道政治“紅綫”。

時光荏苒，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承認自己就是“水門事件”中那個曾被稱為“深喉”的人，他曾向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提供尼克鬆總統“水門事件”的關鍵綫索。我們從“深喉”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國媒體對綫人的保護。40多年來，人們始終不知道“深喉”的真實身份，最大程度保護了綫人。

相比之下，斯諾登比費爾特的表現要激烈、直接得多，可能這與斯諾登年輕氣盛有關。但也許像斯諾登一再強調的那樣，他更多是出自對公眾利益的責任，多少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此外，斯諾登之所以敢公開自己的身份，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國際社會對斯諾登這樣曝光美國信息控制的“英雄”持有更大程度的接納和支持。此前維基解密事件中的阿桑奇，便是一例。



(年輕時的費爾特)



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及其小說《1984》各版封面



方塊知識 6：卷入斯諾登和棱鏡門的商業機構

“棱鏡”，在光學中是一種透明的光學元件，拋光與平坦的表面能折射光線。對於利用各種商業公司的渠道來竊取本國和外國個人、機構信息的情報搜集項目來說，這是一個再貼切不過的代號。

根據斯諾登向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的信息，多家知名國際 IT 公司先後加入了棱鏡項目，分別是微軟（2007 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 年）、臉譜（2009 年）、Paltalk（2009 年）、YouTube（2010 年）、Skype（2011 年）、美國在綫（2011 年）以及蘋果公司（2012 年）。此外，Dropbox 也被指控“即將加入”。根據被披露的“棱鏡”項目細節，美國情報部門從上述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服務器直接進行信息收集。

除了棱鏡項目以外，斯諾登還披露了另外一個“上行”（Streaming）項目，其在承載互聯網骨幹通信內容的光纜上安裝分光鏡，復制其通信內容，涉及的公司包括著名的維賽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一石激起千層浪，斯諾登爆出的這些信息引發了外界的高度關注和對相關公司的指責。各大公司隨後紛紛發表聲明，否認參與到“棱鏡”項目中。但後來，被斯諾登曝光的美國互聯網巨頭轉變了態度。比如，2013 年 6 月 14 日，臉譜稱：“我們在繼續追求更高的透明度，這樣全世界的用戶才會明白，政府是多麼頻繁地以國家安全名義要求我們提供用戶數據。”

業內人士認為，即使不使用臉譜、谷歌等服務器在美國的互聯網服務，也很難保證信息不被美方情報部門獲取。如果不使用美國公司的服務，通訊範圍只局限於國內，通訊是不會被監控的。但是如果中國的骨幹網絡被入侵了，加上了“後門”，這些通訊依然可能被美國監聽。

George Orwell 預言的“1984”已到來？

“溫斯頓的住所在七層樓上，他三十九歲。右腳脖子上患靜脈曲張，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幾次。每上一層樓，正對着電梯門的牆上就有那幅畫着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着。這是屬於這樣的一類畫，你不論走到哪裏，畫中的眼光總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這是喬治·奧威爾在其傳世之作《1984》中的一個片段，文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的上述感受和媒體報道中斯諾登藏匿在香港美麗華酒店內的情形如出一轍，何其相似。報道說，斯諾登害怕外面所有的一切，用毛巾塞上所有的門窗縫隙，他把手機放進冰箱裏防止被竊，每次都給筆記本電腦帶上罩子才敢輸入密碼，外面的火警警報聲更是讓他膽戰心驚，不敢出去看個究竟，唯恐是對他的誘捕……

如此種種，逃亡中的斯諾登似乎生

活在一張巨大的天幕下，美國正如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一樣，看不到、摸不着但又無處不在、無所不在。是的，美國這個“老大哥”在看着斯諾登，他的一舉一動都被納入監控之中，隨時面臨着被抓捕的危險，怎能不讓這個說不清是叛徒還是英雄的斯諾登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

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前工作人員，斯諾登深諳美國情報部門的作風與手段，其尚且如此難逃天羅地網，更何況普通人呢？據斯諾登稱，之所以逃離美國并泄露棱鏡門信息，主要是“我願意做出犧牲，因為我的良心不允許美國政府用龐大的監控機器侵犯民衆隱私，摧毀互聯網自由”。

斯諾登指責美國侵犯民衆隱私、摧毀互聯網自由的理由在於棱鏡這一秘密項目：

(1) 直接接入蘋果、谷歌、臉譜等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器，收集用戶的各種個人信息，包括電子郵件、聊天記錄、信用卡信息等；

(2) 美國政府每日每夜都在收集美國最大的電信運營商威訊（Verizon）的用戶信息，無論其用戶是美國公民還是非美國公民，無論其有無犯罪記錄，無論其通話是國內還是國際；

(3) 美國政府數年來一直在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電腦網絡進行攻擊，包括個人和香港中文大學這樣的機構。

(4) 2009年倫敦舉行20國集團峰會期間，倫敦當局利用特設網吧，在電腦上安裝軟件程序截取電郵及監控數據，又入侵保安系統，監視與會各國領袖及官員通信和電郵文件。

……

倘若真的如此，連各國領袖的信息都在政府（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監控之下，更何況普通民衆呢？祇是大多數時候，我們普通人并不知情，或者即便知道時刻受到監控，但因為沒有影響到日常生活而選擇性地無視“老大哥”的存在罷了。

在這一點上，斯諾登比大多數人表現得更為激烈，也許是因為熟悉美國情報系統內部情況的原因，他成了那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并且單純、懇切地認為自己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

雄——因為他細心地挑選了外泄的文件，確保都是關係公共利益的材料。雖然許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響，但他沒有泄漏。傷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

相比較而言，生活在現實中的斯諾登似乎比生活在虛擬“大洋國”⁹中的溫斯頓更加勇敢，他們一個逃離了現行體制，一個却最終選擇了被體制同化，成為一個閑散的醉鬼。事實上，《1984》這本書最初的名字為“歐洲最後的一個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似乎表達了他內心那種反烏托邦的深刻悲哀與無奈。《1984》中，溫斯頓這“歐洲最後的一個人”停止了獨立思考，屈服了。

而在現實中，幾十年過去的2013年，美國“老大哥”對其他國家的監控比書中的“大洋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值得慶幸的是，溫斯頓也許是歐洲最後一個人，却不是世界最後的一個人，因為有斯諾登——他走了和溫斯頓相反的路，逃離了，反抗了，披露了，盡管他的逃亡之路仍未可知！

2013年7月，斯諾登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大數據”時代的透明與隱私



信息之于民主，就如同貨幣之于經濟。

——托馬斯·傑弗遜（1743-1826），第三任美國總統



信息的透明與隱私，從一開始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永遠都處于一種無法完全調和的狀態。一方面，公衆希望政府信息能夠透明，方便對政府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公衆又希望自己的私人領域不受侵犯，隱私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樣地，對於政府機構來說，其并不想完全公開所有行政信息，因為權力總需要一些灰色地帶來尋找私人利益。但是，政府却希望能夠掌控公衆、甚至其他國家和地區盡可能多的信息，以方便於更大幅度地維護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

美國半個多世紀信息開放、技術創新的歷史，就是一部政府信息隱私與透明的互相鬥爭史。對

注釋：

9 大洋國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一書中虛擬的一個國家，帶有烏托邦的意味。

此，徐子沛在《大數據：正在到來的數據革命以及它如何改變政府、商業與我們的生活》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可參見第一章《歷史爭戰 < 信息自由法 >》。

如果跳脫出政府和公眾的範疇，不同國家之間，特別是強勢國家對弱小國家之間，前者亦非常希望能夠掌控後者盡可能多的信息和數據，以備於維護自身利益。比如，在岸國家對境外世界銀行保密法的一再指責。如此這樣，就構成了一種無解的兩難困境——如何在透明與隱私這條鋼絲繩上保持一種相對的平衡，變得非常重要。

特別是在大數據（Big Data）時代。一方面，人們通過網絡，或者藉由移動手機、平板電腦、社交網絡、各種 Pos 機、會員卡等等

渠道不斷地創造出來巨量的信息，另一方面，通過對這些大數據的搜集、整理、分析、挖掘，再將數據轉化為信息用到各種不同的用途，比如商業消費、競選宣傳、公共服務，甚至一些不為人知的目的。

也就是說，置身于現在的大數據時代，人們的信息全部數據化，而這些都為商業公司 / 政府機構所掌握。對於他們來講，我們就是透明的存在了，這個時候，我們每個人真正成為了數據元件，以一定的邏輯法則串聯，而他們就成為了 CPU，控制我們的一切。我們毫無隱私可言，想想都覺得可怕，似乎有一陣冷風嗖嗖地往脖子裏鑽。

一個沒有隱私的世界，何況境外？

即便讓人覺得冰冷可怕，但却是這個世界的一種真實存在。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透明，也沒有絕對的隱私，有時候甚至當事人就是隱私和透明本身的製造者和泄密者。從這個角度上看，這是一個沒有絕對隱私的世界，斯諾登爆料出來的世界各國元首如此，香港中文大學如此，世界各國的網民也如此。更何況境外世界呢？

2009 年，自從 OECD 推出“白名單”後，稅收信息交換網絡的搭建成為境外世界最為緊迫的任務。隨後 OECD 又專門成立了全球論壇（Global Forum）對境外金融中心所簽署的 TIEA 數量和法律架構進行評估，幾乎所有境外金融中心的稅務信息都可以應在岸國家的要求而得到交換。也就是說，即便是做了一些信托的代名安排，祇要涉及到跨境避稅，祇要在岸國家願意，都可以通過正式的渠道獲得它們想要的信息，比如最終受益人是誰，在哪個環節進行了避稅安排，資金來源是否合法等等。

對於這一點，我們似乎可以從 2013 年 8 月中國山東省濟南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薄熙來所披露出來的信息中得到例證。根據庭審披露，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為了保護 300



方塊知識 7：澳新兩國被指與美國合作監聽

信息來源：財新網

繼英國與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情報監聽合作被斯諾登曝光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被卷入其中。澳大利亞《世紀報》等媒體報道稱，一份美國國家安全局絕密地圖被刊登在 7 月 8 日的巴西《環球報（O Globo）》上，地圖上標示了美國和其盟友數十處截取全球電信和網絡信號的情報收集點。

其中，為代號“X-Keyscore”情報計劃服務的四處機構位於澳大利亞，分別是：設在鬆峽（Pine Gap）的美澳共同防務基地，以及三個隸屬於澳大利亞信號局的機構——位於達爾文附近的肖爾灣接收站、位於傑拉爾頓（Geraldton）的澳大利亞防務衛星通信站以及位於堪培拉郊外的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哈曼通信站。隸屬於新西蘭政府通信安全局的一處位於懷霍派（Waihopai）的設施同樣為這一計劃提供了幫助。

這份地圖由斯諾登向英國《衛報》專欄作家、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提供。7 月 6 日，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通話，也是自斯諾登離開香港後兩人之間的首次對話。斯諾登稱，美國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組成了所謂“五眼（Five Eyes）”情報聯盟，“有時，另外四國的情報搜集工作比美國國安局做得更過分。”澳大利亞政府發言人發言人對“X-Keyscore”計劃拒絕評價。

多萬美元的法國房產安排了複雜的信託和公司架構，但是司法機關還是獲取了完整的證據來證明控股結果完全是薄谷開來和薄熙來的個人代持。事實上，也正是其中一個代持人尼爾·伍德“獅子大開口”勒索代持股份的服務費用，才導致薄谷開來護子心切投毒殺人，並成為觸發薄熙來下臺的導火索。

201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外賬戶納稅法案，其條款要求所有的美國稅務居民和外國金融機構（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下稱“FFI”）必須向美國國稅局報告其美國客戶的賬戶信息；不合作的金融機構若有源自美國的任何收入，包括獲得投資處置收入和來源於美國資產的利息、股息收入，將會被扣繳30%的預提所得稅。

近日，美國宣布將海外賬戶納稅法案的生效時間推遲半年，由原定的2014年1月1日，延遲6個月至2014年7月1日。而原定于2013年10月25日的第一批FFI註冊截止日期也相應延遲6個月。目前美國已與挪威、西班牙、墨西哥、英國、愛爾蘭、丹麥、瑞士、新加坡等9個國家簽署了政府間協議，同時也在與全球超過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相關對話。

以瑞士為例，其銀行保密法已有近80年的歷史，正是這一嚴格保護全球各國客戶隱私的法律使得瑞士銀行蜚聲國際，受到全球客戶的信賴。瑞士雖然不想接受FATCA協定，但根本就不現實。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除非瑞士的金融機構不想繼續在美國運作、被排除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外，否則就得做出妥協。如此一來，瑞士的銀行保密法對美國來說已經名存實亡，但又能如何？

美國稅收“監管風暴”暫時延緩“登陸”，主要是因為一些合作國家（包

括中國）的金融機構還遠未做好準備。即使延遲半年，這一天終將到來。那些通過境外工具來投資、資產規劃的美國人或美國綠卡持有者超過5萬美元的海外賬戶信息，都會被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提交給美國稅務局，隱私將無處遁形。

境外世界受到的上述政策層面的壓力已經開始傳導到實際操作層面，直接影響到一些投資者的營商活動了。對於中間的金融機構來說，以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為例，它們主要從事境外公司國際銀行服務，由於受到美國反洗錢方面的控告，分別支付了高達19.2億美元和6.7億美元的罰款進行和解。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匯豐、渣打這樣的金融機構不得不將壓力轉移給終端的投資者，加大了對銀行開戶的審核力度。

不僅如此，2013年俄國杜馬提議的修正案中已明確禁止境外公司參與政府採購和獲取補貼。從OECD“黑名單”到美國FATCA對以境外公司投資美國的人徵收重稅（比如30%的預提所得稅），再到現在境外公司經營受限以及銀行開戶從嚴，可以看到，某種程度上“狼”真的來了……

宏傑立場

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宏傑對政府機構搜集信息並不會表示盲目的強烈反對。我們知道，每當使用政府的公共服務時，大量的個人信息就會被提交給政府機構。比如，使用政府支持的公立學校、公立醫院所提供的服務時。作為負責任的現代公民，我們應當向政府披露一些私人信息，從而享受政府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以維持我們的安全感。這對政府、社會及我們個人的良好發展都至關重要。

也就是說，我們完全贊同政府在合理、適度範圍內進行信息搜集，因為這並不同於對隱私的侵入。相反，我們只會對那些被政府濫用的信息感到不舒服。某種意義上，斯諾登僅僅公開了美國政府搜集本國及其他國家居民的方法，並沒有公布所涉及到的居民信息細節。

斯諾登事件之所以會在美國成為一個“事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居民在很長時間內都在享受匿名待遇——他們認為私密性和隱私是一回事。在一個國家（包括香港、澳門這樣的司法管轄區），持有身份證是享受該國各種服務的“必備條件”。你知道嗎？一個美國公民，他/她並不需要持有身份證、駕照、護照以及社保賬號。某些情況下，如果你生活在美國，你不能簡單地建立起通常意義上的居民身份，因為並無對你個人居民身份的登記、記錄。因此，對美國人來說，他們很難理解為什麼私密性和隱私不是一回事。

從一個境外從業人員的角度看，

我們一再強調，我們強烈反對將境外架構用作非法目的；與此同時，我們並不反對政府通過合法渠道獲取與其本國居民相關的信息。我們所質疑的是，政府機構獲取私人信息的方式、方法是否合法、合乎道德規範。此外，客戶是否允許或希望中介機構公開其信息，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如果客戶持反對意見，除在政府機構合法、合理提出要求外，我們將秉持“客戶至上”的原則，盡最大努力確保客戶的私密性，不做任何公開和披露。